《元代的通事和译史：多元民族国家中的沟通人物》一文是对蒙古帝国到元朝时期，翻译人员的详细考察，分析了其设立、职权大小、仕途进退、身份高低，作者指出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译职人员地位最高的时期，但随着进入元朝中后期，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减少，译职人员所起的作用也相对降低，这证明了语文不是元朝未能统合中国的重要因素。

《内北国而外中国：元朝的族群政策与族群关系》是本书的同名文章。“内北国而外中国”的说法初读起来似乎颇有诗意，但其实际来自于元末明初的学者叶子奇的《草木子》中，检讨元朝灭亡原因的一段文字“元朝自混一以来，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，内北人而外南人”。所以，这指的是一种“族群等级制”的歧视性制度。本文不是细致的考证性文章，而是宏观性的概括元朝的族群政策与族群关系，因而实证性的证据较少，而描述性、判断性的评价较多。

那些一般性的、“常识性”的部分，不必多谈，如族权顺序、差异待遇、蒙古人的多元文化制等关于族群政策的方面。在检讨元朝的族群关系时，作者的方法仍是分从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心理五方面论说，不过可能是因为篇幅有限，前人的相关研究也算不上深入，故往往浅尝即止，不及深入。如政治关系上，作者还是从“根脚”、所有官员中的各族群比例、科举进途着手，目前笔者尚未见道到有就元朝的上层来分析蒙汉问题的，大多是就中下层或整体而言。经济层面也比较简略，缺乏数据或更具体的证据支撑。

本文是一篇从学界现有（1995）材料为基础的，对元朝的族权关系、族群政策的一次整体审视，有助于于读者对相关问题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。

《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》自社会文化史的观点，试图建立起这样一个观点：元朝中期以后，一个人数虽不庞大，却日益扩张的蒙古、色目士人阶层业已建立，与汉族士人阶层声气相通、紧密结纳，士人群体的意识已经超越种族的藩篱。作者从其出现、社会网络和文化互动着手。就本文来看，虽然蒙古、色目士人阶层的建立，足以表明士人文化的感染力，但似乎其影响主要停留于文艺、一般的思想层面，且对统治者上层影响不深，更不及深层次的政治制度文化，相对有限。